

导 言

元朝,是中国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阶段,又是我国民族第二次大组合时期,它在“北踰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1〕的辽阔领域,形成了一个空前规模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当蒙古统治者由漠北草原向四处发展时,他们还处于奴隶制阶段,在征服欧亚大陆的过程中,他们接受了中原汉文化以及东欧拜占廷文化、西亚阿拉伯文化等先进文化的影响,推动了本身文明的进步。以忽必烈为代表的统治集团,顺应了历史潮流,对内行中原汉法,对外开放交流,促进了元代文化的繁荣。陈垣先生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的结论中,曾单列《总论元文化》一节,对元代文化的成就进行总结。他说:“盖辽、金、宋偏安后,南北隔绝者三百年,至元而门户洞开,西北拓地数万里,色目人杂居汉地无禁,所有中国之声明文物,一旦尽发无遗。”〔2〕充分肯定了元代文化的成就。

〔1〕 《元史》卷五十八《地理志一》。

〔2〕 《励耘书屋丛刻》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2 年影印本。

第一节 元代史学的特点

在开放、多元的文化背景下,元代史学继承了前代的优良传统,伴随着时代发展的进程,在诸多方面有长足的进步。

首先,表现在国史与正史编撰中多民族历史的内容非常丰富。元代史学肇始于蒙古时期用畏兀儿体蒙文写成的国史《脱必赤颜》,这种国史今已散佚,但明洪武年间的汉译《元朝秘史》12卷保存了它的许多重要材料。《秘史》记载了蒙古各氏族部落的源流,成吉思汗的祖先谱系及其生平事迹,窝阔台统治前期的活动,反映了13世纪中叶前蒙古族的历史进程以及与此相关的北方民族关系的变化,是研究蒙古国建立前后的政治军事制度、经济生产、部落战争、社会组织的重要史料。它以描写战争为长,叙事中又配以诗歌,因而其史学和文学价值都很高,是一部不朽的蒙古史著作。《元朝秘史》已有十余种外国语言的译本,对此书的研究已发展为国际性课题,形成了独特的“秘史学”此外,译自蒙文国史的还有《圣武亲征录》,此书译成于元世祖中统年间,篇幅较小。它记载了成吉思汗、窝阔台汗事迹,其内容为《元史》太祖、太宗纪所本。史家认为此书也源自《脱必赤颜》,但书中史实与《元朝秘史》稍有差异。元代继承唐宋史官制度,设立史馆和专职的史官,据《元史·百官志》记载,元翰林国史院史官有学士、修撰、编修、检阅等职,负责各朝实录的编修工作。钱大昕的《补元史艺文志》著录了元朝所修实录,包括《五朝实录》(太祖、太宗、定宗、睿宗、宪宗)、《世祖实录》、《顺宗实录》、《成宗实录》、《武宗实录》、《仁宗实录》、《英宗实录》、《泰宗实

录》、《明宗实录》、《文宗实录》、《宁宗实录》等 13 朝 15 帝的实录,共五百余卷。其中除顺帝 1 朝 36 年无实录外,其它各朝都较完整,这些国史材料记录了元朝的重要史实,虽然今已亡佚,但却为明朝时编写的《元史》提供了基本依据。元代除了有汉文实录外,蒙文国史也还在不断地修订和增补。《元史·虞集传》记虞集主修《经世大典》;“请以国书《脱卜赤颜》增修太祖以来事迹,承旨塔失海牙曰:‘《脱卜赤颜》非可令外人传者。’遂皆已”,可见当时翰林国史院的蒙古、色目史臣还在为《脱必赤颜》一类的国史撰写、补充新材料。

除了国史和相关史料外,元代还很重视对前代史的编修。灭金灭宋时,元朝君臣就注意到对辽、金、宋三史的撰写,搜罗了相关史料,安排了修史人才。由于三朝何为正统的争论和延搁,直到顺帝至正三年(1343 年)三月,三史才正式设局开修,五年十月三史相继修成。其中《辽史》116 卷,《金史》135 卷,《宋史》496 卷。三史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撰成,是由于在此设局修书之前,各史已具备了相当的基础。比如《辽史》在金朝和元初已有 5 次编修的过程,积累的材料丰富而系统,因而最快完成。

《金史》则有保存较好的金实录和王鹗的《金史》为蓝本,而《宋史》则以宋 16 朝大量的国史为基本材料,再加其它史书删削而成。三史在两年内迅速成书,毕竟过于仓促,或失于阙略,或失于芜杂,难免为后世所讥,但三史的修撰又各有所长。例如,《金史》向来被认为是“首尾完密,条例整齐,约而不疏,赡而不芜”,〔1〕在三史中最为完善。《辽史》内容虽较为简略,但因记

〔1〕《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金史》提要。

辽代史事的其它史籍甚少,故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至于《宋史》,史家虽病其繁芜,但从另一方面看,正因其卷帙庞大,才能保存大量的史料,提供文献征实的多种功能。总的来说,辽、金、宋三史的编修是元代史学不断发展的一件大事,三史的完成不仅保持了历代正史编修的连续性,而且与当时的国史、实录等著述一起反映了元代史学民族内容的丰富。

其次,典志体史书编撰的繁荣是元代史学进步的表现。马端临在至元年间撰成的《文献通考》³⁴⁸卷,在元代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这部典志体通史以完整的体例、详密的材料和进步的史学思想,从典制沿革的角度,全面总结了宋以前的历史。元朝历时不久,但却很注意典章制度史的总结。由虞集主编的《经世大典》⁸⁸⁰卷是元代官修最大的典志体史书,《大典》以会要的形式,记载了蒙古时期的历史和社会制度,反映了元初至文宗朝的典章制度沿革,其规模与内容之宏富,可与宋代各朝会要相比。元英宗时纂集的《元典章》分前集、新集,前集 60 卷,记元世祖至延祐七年(1320 年)英宗初政时各项典章制度;新集不分卷,记元初迄至治二年(1322 年)间典制,似为补充前集而未竟之作。前后二集分类不尽相同,内容所录为元廷所颁诏令、律令和有关事例,是法令典制文书的汇编,已与会要体史书以事类为门、叙述典制和有关史实的体例有所不同。《元典章》的会典性质是从会要发展而来的,其体例为后世《明会典》和《清会典》所仿效。《元典章》虽然编次杂琐、条理不清,但它保留了大批元代法令条文的原始材料,在《经世大典》散佚的情况下,此书便成为研究元代各种典章制度的重要文献。元官修法典文书汇编还有完成于至治三年的《大元通制》,它具有民法法典的性质,分制

诏、条格、断例、别类等四项,共 88 卷,全书今已不传,现存的《通制条格》22 卷为原书条格项的大部分内容。此外,又有官修的《宪台通纪》正续集、《南台备要》,以及由王士点、商企翁私修的《秘书监志》。前两者所记为御史台制度,书已失传,仅存《永乐大典》辑本 后者保存完整,全书 11 卷,对有元一代秘书监的建置迁除、典章故实、职官题名皆有详细记载。

其三,元代别史、传记、史注等历史著作得以发展。元代史家在补、注《通鉴》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胡三省所作《通鉴音注》294 卷是一部传世佳作,堪称《通鉴》功臣。胡注的工程极其艰巨,《通鉴》本身部帙浩繁,有 300 余万字之多,而胡注的字数则接近于正文。其所涉及的范围极广,举凡《通鉴》记述的赋税、职官、舆服、刑法、天文、历法、乐律、地理等典章制度和有关名物,都详加音训注释,并指出原文或其它注文的谬误,尤其是官制、地理两项,考证更为精密。胡三省还在注文中阐发自己的史学观点和见识,对史实、史法作出评论,并借注释表露他忧国忧民、反对民族压迫的思想。对于《通鉴》的补作、续作则有元初金履祥的《通鉴前编》18 卷和元末陈桱的《通鉴续编》24 卷。金氏书采《诗》、《书》、《礼》、《春秋》及诸子旧史,详加训释,对三代史事考订颇多 叙事上起唐尧,下接《通鉴》,补写了周威烈王以前史事,故号为前编。陈桱书第一卷述盘古至高辛,意在补金书所未备 第二卷采契丹在唐、五代事迹,以记辽国之兴 其余 22 卷皆记宋、辽、金三朝历史 其书仿朱熹《通鉴纲目》之纲目体,并在三朝史事的编排上强分正朔,但有关辽、宋的史料较多,可资利用。元代还有一批研究《通鉴纲目》书法的著作,意在正“夷夏之辨”,多不关乎史实,故不为后世所重。

苏天爵的《元朝名臣事略》是元代杰出的传记体史书,取当世文献记当代名臣名士,具有较高史料价值。对旧史改造,是史家根据自己的思想和观点重新组织材料、形成新著的一种重要手段。元初郝经的《续后汉书》90卷,就是对陈寿《三国志》的改造,在王朝统绪上,升刘蜀为正统,贬曹魏在闰位,其可取之处,在因《三国志》无志书,特立疆理、职官、食货等八录为志,具有编纂学上的意义。此外,又有一批别史杂记。如王鹗《汝南遗事》、刘敏中《平宋录》记元灭金灭宋史迹,权衡《庚申外史》记顺帝朝36年大事,刘佶《北巡私记》述元末兵败、顺帝北逃情形。元代历史笔记的内容也很丰富,其中以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最为突出。全书30卷,记事585条,所记以元代典章制度、历史掌故、元末农民起义为多,其次对于典籍、书画、戏曲、诗文也多有考证评论。又如《山居新语》、《研北杂志》、《农田余话》、《至正直记》等笔记,对元代社会生活、文化、朝野轶闻都有大量记载;《乐郊私语》、《草木子》则对元末历史有诸多反映,可资利用。以上史著,所记多为当朝史事人物,由此也可看出元代史家对当代史撰述的旨趣。

其四,元代地志和行纪的成就大大超过前代。元代的方志在前代基础上取得较大进展,官修地理总志《元大一统志》初修本为755卷,增修本达到1300卷,它综合了唐宋总志的体例,分建置沿革、坊郭乡镇、里至、山川、土产、风俗、形势、古迹、宦迹、人物、仙释等门类,比之前代总志,体例更为齐备,从而完成了全国性地理总志的定规,并为明清一统志所承袭。《元大一统志》已佚,现存仅有赵万里的辑本10卷。除官修的一统志外,私家撰写的全国性总志还有虞应龙的《统同志》、萧𣎵的《九州志》、郝

衡的《輿地要覽》、滕賓的《萬邦一覽集》、朱思本的《九域志》、佚名的《元混一方輿勝覽》等。^{〔1〕} 這些總志多已散佚，僅有後兩者的元刻殘本傳世。元疆域遼闊，纂修方志的範圍比前代大得多，據張國淦《中國古方志考》統計，元修方志約 160 種，數量超過了宋代。現存元修方志的全本或輯本仍有 14 種，從其記載內容、體例和方志理論上看，都比前代有較大的進步。元代方志比宋代方志較少浮華的文人情調，而更注重紀實，保存了大批原始的风俗記錄和經濟檔案，這對明清兩代方志重掌故紀實的风尚有所影響。元代方志學對方志的性質、功用、淵源、編撰方法等問題，提出了不少新見解，他們在方志編撰的實踐中，總結出許多寶貴的经验，其中如張鉉的《至正金陵新志修志本末》凡例九條，則是現存最早的修志準則。蒙元的行紀著述也很豐富，《長春真人西遊記》、《西遊錄》、《北使記》、《真臘風土記》、《島夷志略》都是世界聞名的重要行紀，對於反映中外交通歷史，對於研究 13、14 世紀的亞洲文明和世界文明史，都有重要作用。

第二節 元代史學思想的發展

史學思想是史學的灵魂。元代史學的成就除上述外，最重要的還是史學思想順應時代的要求，有了顯著的進步和發展。自忽必烈建元以後，元朝經歷了幾個重要的發展階段，一定的史學思想總是一定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在史學領域的反映，因此，認識元代史學思想的發展應該結合元代社會的進程來考察。

〔1〕 見張國淦《中國古方志考》，中華書局 1962 年版。

一、元代前期，主要指忽必烈时期。这一阶段是社会巨变、社会矛盾发展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建立时期。元世祖忽必烈在其先辈西征扩土，灭夏、灭金的基础上锐意进取，于中统元年（1260年）登大汗位，至元八年（1271年）定国号为元，建立元朝。5年后元兵攻占南宋首都临安，至元十六年（1279年）消灭南宋，统一了全国。与此同时，以忽必烈为首的元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建设国家机器和巩固统治的措施。一方面，忽必烈意识到蒙古以武力得天下“武功迭兴，文治多缺”的问题，〔1〕并早在即汗位前受命治理漠南汉地时，接受了儒家学说的观点，任用了各族儒生。建国以后，为了适应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基础，他采取了一些“变易旧章”的文治措施，同时为笼络汉族地主阶级，利用汉族儒臣来协助新朝立朝仪、制典章，也实行了若干有利儒士的政策。但是另一方面，作为蒙古贵族的总代表，忽必烈又不能不为偏袒蒙古贵族的利益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在元朝初年，北方和江南的汉族儒士则经历了“天崩地陷”的巨变，他们不仅有亡国的痛楚，又因蒙元统一战争的杀掠和民族歧视政策的压迫，饱受身心的双重苦难。

社会巨变必然引起意识形态领域产生多种反映，因而元初的史学思想领域是多姿多彩的。首先是如何对待元朝统治和民族关系的各种思潮。元初史学家胡三省在他的史学力著《通鉴音注》中，便通过论说史事申斥元朝横暴统治，表达故国情思，“充分表现了民族气节和爱国热情”。〔2〕这种正当的反对民族

〔1〕《元史》卷四《世祖纪一》。

〔2〕陈垣：《通鉴胡注表微》后记，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压迫的思想,在金履祥的《通鉴前编》中也有所流露。反映民族不满情绪的另一方面,是元初一批学者通过研讨朱熹的《通鉴纲目》,倡揭朱熹的‘正统’理论和‘夷夏之辨’思想,意在为南宋争正统,这是从消极的方面表露对异族统治的不满。与江南士大夫新近亡国的‘切肤之痛’相比,北方汉儒因长期生活于少数民族政权统治地区,使他们能以比较务实的态度看待民族关系问题。另外,金亡四十余年,他们目睹蒙元统一大业的进程,又受到忽必烈等一些蒙古统治者好儒崇礼的影响,思想已有了较大转变。于是,郝经提出了‘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的思想,走与元廷合作的道路。同样承认元朝统治的北方大儒许衡则为元廷总结‘行汉法’的历史经验。以郝经、许衡为代表的思想家和史学家,通过考察历史而提出的正确主张,为化解民族矛盾、促进民族合作发挥了作用,反映了元代民族史观的进步。另外,杨奂的《正统八例总序》和修端的《辨辽金宋正统》也在史学的‘正统’之辨中提出了不同于‘夷夏之辨’的新观点。

元初史学思想的另一个特点是在改朝换代之际注重历史的总结。忽必烈即位初,就已有撰修辽、金二史的动议,并于至元元年(1264年)“立翰林国史院”。〔1〕元灭宋以后,又不断有修辽、金、宋三史的建议和措施。这些都反映了元初朝臣的历史意识。翰林国史院则在三史资料的收集、元代历朝实录和其他官修史著的编撰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元代前期尤为引人瞩目的是著名史学家马端临撰写的《文献通考》,这部史学巨著从典志史的角度,对宋以前的历史进行了全面总结。马端临的

〔1〕《元史》卷五《世祖纪二》。

史学思想是对杜佑、郑樵优良史学传统的发展,在元代史学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元初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件大事,就是理学北传。理学为元代史学家和思想家在历史领域进行理性思辨提供了哲学依据,从而提高了史学的思想认识水平。受理学思辨精神和观点、方法的影响,史学家们注意透过纷繁史事,探求历史兴衰治乱之由,发展史学的通变史观。元代史学还注意从儒家政治伦理目标和道德责任感的角度,在‘正君心 〇 顺民心’等方面,总结道德修养所激发的精神力量在社会实践中的历史作用。元代理学对于宋末理学高谈性理、流于空疏的风气有所改变,相对来说多了一些务实精神,不少理学家也很重视史学,如郝经、刘因在重视六经的基础上,提出‘古无经史之分 〇 会通经史’的思想,而金履祥则将考经和考史结合起来。这种倾向对于提高史学的地位,推动元代史学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元代中期,即元成宗到元文宗数朝。成宗、武宗两朝,以“惟和守成”为国策,大体在忽必烈所奠定的汉法、蒙古法、回回法微妙平衡的政治格局下进行统治。武宗以后,仁宗、英宗、文宗都能书法、诗赋,汉文化素养很高,因而从仁宗起就大有‘崇文右儒’的气象。仁宗延祐年间恢复科举,又以祭孔、褒封孔子五十三代孙、将宋元十大理学家从祀孔庙等措施,崇儒兴文,扩大孔孟程朱的影响。他好读书、重历史,在研读《贞观政要》之后,认为此书有益于国家,便命人“译以国语刊行,俾蒙古、色目人诵习之”。〔1〕为了表示对史学的重视,他将翰林国史院的官秩升

〔1〕 《元史》卷二十四《仁宗纪一》。

为从一品,并告谕省臣曰:“人言御史台任重,朕谓国史院尤重;御史台是一时公论,国史院实万世公论。”〔1〕由此可见仁宗的历史见识。继仁宗以后的英宗、文宗也都大兴文事,总的看来,元中期政治进一步汉化的趋势非常明显,本可以一新制度,造就中兴盛世,但由于各种政治力量间的反复争夺,皇位更迭频繁,因而文治最终只停留在粉饰表面的行为上,而未能深入下去。

由于元中期崇文右儒的政治倾向,所以此期官修典志、史书的成果特别显著。先是于大德七年(1303年)完成了开修于世祖时期,后来增修的《元大一统志》,使这部大型地理总志达到1300卷。此后,又于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完成了政府组织法和各专门法令的汇编《元典章》,于至治三年完成了刑法、民法法典《大元通制》,于文宗至顺三年(1333年)完成了大型典志体史书《经世大典》880卷。这些法典、史志的编撰,表明了元代史学家和元廷总结元初以来典章制度的沿变,为后来者经世治国提供规范和参考的历史观念。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典志史《经世大典》,至今保存下来的大典序录反映了虞集等史官赞颂元朝统一局面,总结爱民厚生经世主张,表彰德治教化功用等思想,是元中期史学思想的杰出代表。仁宗、英宗、文宗三朝还先后有编修三史的动议,袁桷在英宗时会受命主持编修三史的工作,他的《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2〕表达了文献收集的详密主张。但袁桷的工作因英宗被弑而停顿,其它编修三史的动议也因体例未定而不果。另外,由于元朝的对外开放政策和中外交

〔1〕《元史》卷二十四《仁宗纪一》。

〔2〕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四十一,四部丛刊初编本。

流的频繁,元中期还出现了一些记载中外交往、记载域外史地的史志,如陈大震的《大德南海志》、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这些史著反映了元代开阔的史学思想和历史意识。

三、元代后期,即元顺帝时期。元代后期是元朝逐步走向没落的阶段,元顺帝即位时,伯颜擅权,废除汉法,排斥汉人、南人,吏治腐败,社会动荡。顺帝起用脱脱,驱逐伯颜,实行‘更化’措施,恢复汉法文治。在至正年间前9年的‘至正新政’中,顺帝励精图治,其中由脱脱主持的‘更化’政策,主要是废除伯颜旧政,调整与汉族地主阶级的关系,编修三史,加强文治,这些目的基本达到。后几年新政由顺帝亲自主持,希望完善法制、加强廉政、选拔人才,但未能达到预期目标,尤其是‘至正新政’没有触及财政危机、土地兼并严重等尖锐的社会问题,因此无法挽回元末积重难返的衰势。

元朝后期史学的最大成就是修成《辽史》、《金史》、《宋史》三部纪传体正史。三史的编修是脱脱‘更化’措施的内容之一,通过修史,知前代‘制度、典章,治乱、兴亡之由’,^{〔1〕}以古鉴今,以求改善当时的统治。因而,三史中的历史借鉴思想是非常丰富的。三史编修中另一重要史学思想是三史‘各与正统’原则,这一原则表达了平等对待各民族历史的进步史观,并由此保证了对辽、金、宋时期各民族历史进程的记载,特别是保证了对辽、金少数民族历史的记载,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民族史料。元代后期,随着故老凋零、旧文散失,一些史家从考核当代史实出发,或博采文献,或参稽记注,继续在史学领域里耕耘,苏天爵是其中

〔1〕 元顺帝:《修三史诏》,见《辽史》附录,中华书局本。

的杰出代表。他的《元朝名臣事略》保存了许多元初人物的传记资料,他编辑的《元文类》虽是一部诗文总集,但也有大批颇具史料价值的文献。苏天爵有关文献收集、考证的思想和方法,也是元代史学思想的组成内容。此期关于域外记载的史著则有周致中的《异域志》和汪大渊的《岛夷志略》,特别是汪大渊在他的著作中所表达的关于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观,充分体现了元代的世界观念和开放精神,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

第三节 元代史学思想的研究及意义

如前所述,元代的史学成就是非常显著的,尤其是元代的史学思想,内容丰富,特点突出,在中国史学思想史,乃至中国思想史领域中都占有重要地位。那么,对元代史学包括元代史学思想的研究状况如何呢?

纵观我国从明清以来对元代史学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到,首先,对于元代史学的文化背景和史学本身的基本情况是廓清了。多年来的元史研究,尤其是 80 年代以来对于元代政治、经济、文化、对外交流等方面研究的丰硕成果,为我们认识元代史学的社会背景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翁独健先生对元代文化思想的论述,陈高华先生对元代理学、宗教、艺术等多方面的研究,以及韩儒林先生的《元朝史》,蔡美彪先生的《中国通史》(元史卷),白寿彝先生总主编、陈得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元史卷)等有关元代文化的内容,侯外庐先生的《宋明理学史》有关元代理学的内容,都启发我们有联系地看待元代史学的发展。大量的史学史著述则说明了元代史学的基本情况,从元修三史、《元典

章》、《元大一统志》、《经世大典》编修,看到元代官修史书的延续和进步。从郝经、金履祥、胡三省、马端临、苏天爵的著作,以及一些游记、方志的撰作,可以反映元代志书、别史、杂撰、史注等史学著作的发展,^{〔1〕}其中最早出版的金毓黼的《中国史学史》,则已对元修三史所用材料、三史参修人员、三史修撰经过,以及对三史的优劣评价,作出较为详细的考证和介绍。以后有关著作,多在金书的基础上叙述三史编修过程。此外,金书还对《经世大典》、《元大一统志》的编写过程和参修人员、存佚情况作了介绍,对郝经的《续后汉书》、金履祥的《通鉴前编》、陈桱的《通鉴续编》、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胡三省的《通鉴音注》以及元代若干地方志皆有叙述,尤以对《文献通考》的评述、考辨更详。除有关的史学史著作外,白寿彝总主编、陈得芝主编的《中国通史》(元史卷)则从元史研究的角度,对元人撰写的一批重要的游记、史传、笔记、文集进行评述,对一批重要的蒙、藏、回文和外国史料进行评介,尤以对《元朝秘史》的研究情况介绍为详。

其次,对于元代史学的一些重要人物如马端临、胡三省有了较深入的研究。胡、马二人《元史》皆无传,马端临在《宋元学案》中还有一些记载,胡三省事迹只有一些零星材料。20世纪40年代,经陈垣、周祖谟二先生的考证,终于使胡氏生卒年和有关事迹得以了解。尤其是陈垣先生在抗日战争期间闭门艰苦创作的《通鉴胡注表微》,^{〔2〕}更是通过对胡三省的生平、处境、思想,

〔1〕 有关的史学史著作可参照书后所附“本卷主要参考书目”。

〔2〕 《辅仁学志》13卷1、2合期,14卷1、2合期。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中华书局1962年版。

以及胡三省作《通鉴音注》的原因、隐含在注释中的感情,作了全面的研究。陈垣先生的《通鉴胡注表微》引用胡三省的注释 750 多条,引证书籍 250 多种。全书分 20 篇,前 10 篇讲史法,后 10 篇讲史事。书中阐幽发微,不仅揭示了胡三省思想和学术,而且对历史研究法也多有论述。更为可贵的是,无论言史法还是言史事,陈先生都结合‘胡注’的思想和议论,发挥自己的政治见解和史学思想,斥敌斥伪,宣扬民族气节,表达爱国思想。对马端临及其《文献通考》的研究论述则更多。白寿彝先生曾于 1960 年发表《元代马端临进步的史学思想》〔1〕一文,从马端临对杜佑、郑樵史学传统的发展,马端临史论的科学因素,马端临史论的人民性等三方面分析了马端临史学思想的进步意义,深刻而精辟。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对胡三省、马端临的研究有了纵深发展,〔2〕特别是吴怀祺先生在《宋代史学思想史》一书中,将生活于宋末元初的胡、马二人分别列专题研究,深入开掘、阐发了胡、马二人的史学思想,有许多独到的新见解。《宋代史学思想史》以及吴先生的新著《中国史学思想史》中关于史学思想的研究对象、方法的论述,以及关于中国史学思想发展渊源流

〔1〕《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2〕如仓修良《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中有关胡三省及《通鉴音注》的内容,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陈光崇《中国史学史论丛》中有关马端临及《文献通考》的内容,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王瑞明主编《〈文献通考〉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 又如王培华的《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的史学意义》,《河北学刊》1996 年第 4 期 陶懋炳《马端临史学的科学性初探》,《史学史研究》1982 年第 4 期 瞿林东《〈文献通考〉的理论价值》,《安徽史学》1993 年第 2 期。

变的论述,对于元代史学思想的研究皆有切实的意义。

再次,对元代一批重要史著的撰写、内容和成就,也分别有了深入的考订和分析。例如瞿林东等人对元修三史的研究,〔1〕以及其他学者对《元典章》、《元朝名臣事略》的探讨,〔2〕包括已经散佚的《元大一统志》和《经世大典》,也有辑本和考订论著。〔3〕至于蒙古时期出现的《元朝秘史》,则无论从文字的音、形、义,到内容的来源、作者、价值,包括全书的校注、翻译,都做了大量的工作。〔4〕

港台地区的元史研究当以台湾为重镇,主要原因是那里有一支固定的、新老接替的研究队伍。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台

〔1〕 瞿林东《辽金宋三史略论》,见《中国史学散论》,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 刘凤翥、李锡厚《元修宋辽金三史再评价》,《社会科学辑刊》1981 年第 3 期 邱树森《脱脱和辽宋金三史》,《元史及北方民族史集刊》1983 年总 7 期。

〔2〕 1931 年陈垣先生以元刻本和其他材料校沈刻本《元典章》,撰成《沈刻〈元典章〉校补》和《元典章校补释例》,见《励耘书屋丛刻》第 1 集第 2、3 种又有李淑娥的《〈元典章〉试析》,《史学月刊》1986 年第 1 期 姚景安的《苏天爵及其〈元朝名臣事略〉》,《文献》1989 年第 3 期。

〔3〕 如赵万里的《元一统志》辑本,中华书局 1966 年版 汪慎荣的《元史诸志与〈经世大典〉》,《社会科学辑刊》1990 年第 2 期 温岭的《元代政书〈经世大典〉中的人物传记》,《中国史研究》1992 年第 1 期。

〔4〕 如王国维《蒙元元朝秘史跋》,《学衡》49 期 陈垣《元秘史译音用字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34 年版 道润梯布《新译简注蒙古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余大钧《〈蒙古秘史〉成书年代考》,《中国史研究》1982 年第 1 期 甄望《〈蒙古秘史〉源流研究概述》,《蒙古史研究》1987 年第 2 期 色音《试析〈蒙古秘史〉中的古史传说》,《内蒙古社会科学》1991 年第 3 期。

湾以姚从吾为首的元史研究者，对元代史学的研究也取得不少成果。在对元代史著的整理研究方面，最具权威性的是姚从吾、札奇斯钦二人译注的《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1〕以及《姚从吾先生全集》第五册中有关《蒙古秘史》研究的数篇论文。此外，又有苏振申的《元政书经世大典之研究》，〔2〕书中特别讨论了《经世大典》与元代其它史料的关系及辑佚的方法。而陆铁乘、萧后庆则分别研究介绍了《文献通考》、《元朝名臣事略》及其作者，陈芳明则论述了辽、金、宋三史的编撰过程。〔3〕在对元代史家和有关思想家的研究方面，除上述学者对马端临、苏天爵的评介外，还有程元敏对金履祥的研究，〔4〕及孙克宽在其《元代汉文化的活动》〔5〕的第二编、第四编中对许衡、郝经、虞集、苏天爵等人的研究。又有部分学者从思想史的角度研讨许衡、刘因和吴澄，其中以研究许衡的论著为多。对元代史学的某一方面作综合考察的则有王明荪的《元代史馆与史官》，〔6〕该文阐述了元代起居注和日历的编撰，翰林国史院的建置与沿革、职掌与品秩，对元代修史制度有较为系统的分析。台湾学者对元代史学

〔1〕 见《台大文史哲学报》9~11期，1960~1961年。

〔2〕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 1984年版。

〔3〕 陆铁乘《〈文献通考〉及其作者》，《中央月刊》6卷9期，1974年7月。萧后庆《苏天爵和他的元朝名臣事略》，见《元史新探》，台湾新文丰1983年版；陈芳明《宋辽金史的纂修与正统之争》，见《宋史研究集》七，1974年版。

〔4〕 《宋元之际的学者——金履祥和他的遗著》，见《宋史研究集》四，1964年版。

〔5〕 台湾中华书局 1968年版。

〔6〕 《第三届史学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湾中兴大学 1991年版。